

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及其影响因素

罗教讲 涂洪波

【摘 要】 文章在西方行为归因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并运用实证调查资料对理论进行假设检验,分析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成就归因与个体行为归因具有同样的规律;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对人们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运行状况具有比较好的解释力。

【关键词】 社会认知 行为归因 社会成就归因 影响因素

【作 者】 罗教讲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涂洪波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一、归因与社会成就归因

解释人类行为因果规律的理论称为归因理论,它是社会心理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归因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海德(Heider,1958)发现人际交往中归因推断的存在并系统地分析了这种归因的活动规律,由此拉开了归因研究的序幕。20 世纪 60、70 年代形成了归因研究的热潮。随着归因研究的发展,归因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对归因理论的探索不断深入,并逐渐形成了主导归因研究方向的领域,这就是成就归因研究,其领军人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韦纳(Weiner)。韦纳等人(1979)发展了海德传统的归因理论,把它和 J·W·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结合起来,建构出了成就归因理论。这种理论把人的成就归因分为内在归因(如能力、努力等)和外在归因(如环境、任务难度、运气与机遇等),发现不同的个体对自己与他人获得成就的归因存在显著性差异。

成就归因理论及其分析模型,成为当时归因研究的权威理论与主要方法范式(Ajit K. Dalal, 1988: 6~7)。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认知心理学的兴起,社会认知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社会认知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归因理论的发展,因为归因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内容。社会认知分析范式下归因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为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SP)研究归因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传统的归因研究几乎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P)一统天下,研究者运用心理学方法(主要是实验室研究方法)研究个体行为归因问题。社会认知的客体是人的行为及以人作为载体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社会认知的主体不仅可以是个体、群体,而且可以是社会公众。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用实验方法研究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认知,而且可以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如问卷调查法)研究社会大众的社会认知(包括归因)问题(Morris 等,1990:26~30)。

中国的归因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理论的探索和实验研究,几乎都是在韦纳归因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进行的。由于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认知分析框架内进行的归因研究所知不多,这方面的中国本土研究很少。就归因研究的内容来看,中国的归因研究绝大多数局限在与教育有关的狭窄领域,很少向其他领域拓展。

客观地说,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了社会认知范式下的归因研究,钟毅平(1999)在《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认知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西方社会认知与归因研究的发展与成果。关秉寅、黄毅志(1997:151~182)运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通过对问卷调查所获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研究了台湾公众的成就归因问题。

把归因的对象确定为社会成员取得的成就的途径或方法,我们称这种归因为社会成就归因,以区

别于个体成就归因。社会成就归因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取得成就途径或方法的倾向性认知与解释。一般来说,不同的个体会存在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取向,当我们把社会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社会成就归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和规律性。

从社会层面来说,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可以反映出社会的运行状况,甚至可以说社会成就归因是社会运行状况的函数,因为社会成就归因倾向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成员如何取得成就这一重要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认知与反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加快,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这种社会运行状况或社会事实,可以通过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反映出来。

从个体层面来看,具有不同特征、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成就的取得会有不同的认知与解释,即不同的社会个体会有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取向(M·H·邦德,1990:231~232)。对个体的成就归因,传统归因理论通过实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功行为归结为内在原因(能力与努力),把失败行为归结为外在原因(环境障碍、任务太难、机遇或运气不好)。而且,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归因与对他人行为的归因存在明显的差异,倾向于把别人的行为归结为外在因素(环境、运气),而把别人的失败行为归结为内在因素(无能力、不努力)(W·S·萨哈金,1991:509~522)。社会成就归因与个体归因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个体成就归因的对象是具体的,即自己的成就与失败或具体他人的成就与失败;社会成就归因的对象则是社会成员取得成就这种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既包括认知主体自己也包括他人成就的取得。显然个体归因与社会成就归因之间存在联系,并可由个体归因研究的结论来推断社会成就归因的可能结果(Michael Argyle,1997:293~297)。在社会中,成就的取得者或成功者通常就是那些收入比较高、向上流动、社会地位比较高、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的人们,他们倾向于把自己成就的取得归因为内在因素(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尽管他们存在把别人的成就归因于外在因素(关系与机遇等)的倾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中取得成就越大者,其社会成就内在归因的倾向应该越强。与此相反,社会中的“失败者”,也就是那些收入较低、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和生活满意度都比较低的社会成员,他们存在把社会成就(别人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外在因素(关系与机遇等)的倾向。

这就是我们从个体归因理论推演出来的社会成就归因的理论逻辑或理论假设。我们要用实证资料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和解释力。为此,我们确定本研究的理论假设:(1)男性与女性在社会成就归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人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满意度都不影响其社会成就归因倾向。(3)在社会阶层体系中,职业地位不影响人们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4)社会流动经历不影响人们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

二、研究的方法

(一) 资料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00年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受市政府资助完成的一项题为“武汉人、武汉文化与武汉经济发展研究”的研究课题。该课题一共在武汉市7个城区内随机抽取了39条街道、208个居委会、3 088户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3 009份,调查对象是在武汉市生活、工作并具有武汉市户口的18~65岁中国公民。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成就归因。我们用8项指标来测量公众的社会成就归因取向,即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机遇或运气、个人天赋、个人能力、个人努力、个人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政治身份。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在上述8项指标中选出3项他们认为对于社会成就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每项

因素选中为 1, 不选为 0, 在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作二分变量处理^①。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1)性别,在回归分析中作虚拟变量处理,男性为 1,女性为 0。(2)年龄,为被调查者的实足年龄多少周岁。(3)受教育程度,用实际所受学校教育年数作为测量指标。(4)年收入,分为 1 万元以下、2 万~3 万元、3 万~4 万元、4 万元以上 4 个等级,在回归分析中作虚拟变量处理。(5)个人满意度,我们主要测量被调查者的“职业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并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5 个等级分别赋值 5、4、3、2、1 分,在回归分析中作为定距变量处理。(6)职业与阶层地位,我们把众多类型的职业合并为管理干部(包括企业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简称“管知”)、职员与个体私营业者(简称“私职”)、工人和无一定职业者(包括下岗未就业者,简称“无职”)四类。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们把职业作为阶层地位来对待,因而离退休人员不考虑在内;二是按大类划分阶层地位,因而按管理干部(包括企业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职员与私营业者、工人、无一定职业者(包括下岗尚未就业者)由高到低划分阶层地位^②。被调查者父亲职业与阶层地位测量方法,与本人职业与阶层地位测量方法相同。(7)社会流动经历,我们运用代际职业流动指标进行测量,即测量父辈职业与子辈职业的流动关系。在回归分析中,社会流动经历作虚拟变量处理,共 12 个虚拟变量,以“父无职子无职”为基点 0。

三、分析结果

(一) 基本资料分析

从表 1 可知,把社会成就归因为“个人努力”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个人能力”,再次是“机遇或运气”。这三项因素在社会成就归因中一致性都超过 50%。一致性稍低的社会成就归因因素依次是“社会关系网”、“受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或出身”,相比之下,人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天赋”和“政治身份”。

我们把“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合并归类为“背景与关系归因”;把“个人天赋”、“个人能力”、“个人努力”合并归类为“能力与努力归因”;把“受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合并归类为“教育与身份归因”;“机遇与运气”称为“机遇与运气归因”^③。之所以把教育与身份并列,是因为教育虽然与能力

表 1 被访者社会成就归因频数分布(N=3 009) %

| 影响因素 | 重要 | 次重要 | 影响因素 | 重要 | 次重要 |
|---------|------|------|-------|------|------|
| 家庭背景或出身 | 27.3 | 72.7 | 个人能力 | 55.1 | 44.9 |
| 社会关系网 | 37.5 | 62.5 | 个人努力 | 60.5 | 39.5 |
| 机遇与运气 | 50.1 | 49.9 | 受教育水平 | 28.4 | 71.6 |
| 个人天赋 | 17.8 | 82.2 | 政治身份 | 3.6 | 96.4 |

有关,但在当今社会,教育已经主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身份符号,通过受教育所获得的学历和文凭是一个人进入社会重要位置、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曲恒昌、曾晓东,2000:241~242)。合并归类后得表 2^④。

① 关秉寅、黄毅志(1997)测量成就归因的方法是用利克特态度量表对各项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评价。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量表中问题的分辨力下降,因为对于成就的取得来说,所列各种因素都是重要的,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因此要被调查者回答重要不重要时,他们可能回答都很重要。在所列因素中限制选出最重要的 3 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此时被调查者必须进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② 按职业划分阶层地位,我们参照的是陆学艺(2002)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③ 成就归因合并归类的依据是传统的成就归因理论与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传统的成就归因理论,把成就归因为能力与努力(内在归因)和环境、机遇与运气(外在归因)。关秉寅、黄毅志把能力与努力称为内在归因,把背景关系、机遇与运气叫作结构归因,把教育单独列为教育归因。这就是说,关于成就归因的归类已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本文合并归类依据的便是这种模式。

④ 合并归类的方法是,被合并各项因素中凡有 1 项以上被选为“相比之下更重要(取值 1)者”即在合并项中被作为“相比之下更重要(取值 1)”,其余皆视为“相比之下次重要(取值 0)”。

从表2可以看出,人们对社会成就的“能力和努力归因”意见最为一致;其次是“背景与关系归因”;再次是“机遇与运气归因”;最后是“教育与身份归因”。“能力与努力归因”被称为“内在归因”,而“背景与关系归因”、“机遇与运气归因”则称为“外在归因”。

表2 4种社会成就归因倾向频数分布表(N=3 009) %

| 社会成就归因类型 | 重要 | 次重要 |
|----------|------|------|
| 背景与关系 | 52.5 | 47.5 |
| 能力与努力 | 88.0 | 12.0 |
| 机遇与运气 | 50.1 | 49.9 |
| 教育与身份 | 30.9 | 69.1 |

(二) 多元回归分析

表3是对社会成就的背景与关系归因和能力与努力归因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3 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 自变量 | 背景与关系归因 | | | 能力与努力归因 | |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性别(女) | | | | | | |
| 男 | 0.138 | 0.142 | 0.153 | -2.090 | -0.229 | -0.229 |
| 年龄 | -0.026*** | -0.023*** | -0.021*** | 0.013* | 0.004 | 0.002 |
| 受教育水平 | -0.085*** | -0.045* | -0.042* | 0.080*** | 0.034 | 0.028 |
| 职业地位(无一定职业者) | | | | | | |
| 管理干部与知识工作者 | | -0.485** | 0.939 | | 0.567* | -0.918 |
| 职员与私营业者 | | -0.356** | 0.386 | | 0.215 | -0.697 |
| 工人 | | -0.145 | 0.279 | | 0.424* | 0.666 |
| 收入水平(1万元以下) | | | | | | |
| 1万~2万元 | | -0.202 | -0.195 | | 0.280 | 0.275 |
| 2万~3万元 | | -0.333* | -0.310* | | 0.545* | 0.525* |
| 3万~4万元 | | 0.261 | 0.289 | | 0.053 | 0.024 |
| 4万万元以上 | | -0.246 | -0.199 | | 1.646* | 1.610* |
| 满意度 | | | | | | |
| 职业满意度 | | -0.033 | -0.028 | | -0.118 | -0.122 |
| 收入满意度 | | 0.076 | 0.066 | | 0.062 | 0.065 |
| 地位满意度 | | -0.046 | -0.037 | | 0.261** | 0.263** |
| 代际职业流动(父无职一子无职) | | | | | | |
| 向上流动 | | | | | | |
| 父职私一子管知 | | | -1.180 | | | 1.879* |
| 父工人一子管知 | | | -1.133 | | | 1.789* |
| 父工人一子职私 | | | -0.140 | | | 0.902 |
| 水平流动 | | | | | | |
| 父管知一子管知 | | | -0.977 | | | 1.514* |
| 父职私一子职私 | | | -0.609 | | | 1.554* |
| 父工人一子工人 | | | 0.023 | | | -0.141 |
| 向下流动 | | | | | | |
| 父管知一子职私 | | | -0.445 | | | 1.021 |
| 父管知一子工人 | | | -0.046 | | | -1.461 |
| 父管知一子无职 | | | 0.550 | | | 0.583 |
| 父职私一子工人 | | | -0.289 | | | -1.650 |
| 父职私一子无职 | | | 0.305 | | | -0.351 |
| 父工人一子无职 | | | 0.416 | | | -0.106 |
| Constant | 2.110** | 1.915*** | 1.421* | 0.628 | 0.429 | 0.474 |
| -2LL | 2905.307 | 2876.962 | 2865.94 | 1596.795 | 1556.551 | 1540.573 |
| Chi-square | 61.308*** | 89.653*** | 100.675*** | 15.431** | 55.675*** | 71.653*** |
| DF | 3 | 13 | 25 | 3 | 13 | 25 |

注:自变量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即基点项。* P<0.05, ** P<0.01, *** P<0.01。

在背景与关系归因模型中,性别对背景与关系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P>0.05$)。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存在显著性影响,且回归系数都取负值,表明年轻者较年长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受教育水平越低越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同时,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在有无其他变量作用的情况下都一样显著。在模型1中,只控制了性别因素,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都非常显著($P<0.001$);在模型2和模型3中,当分别控制了职业、收入、满意度和代际职业流动经历后,影响作用仍然显著。这表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作用非常强烈,不因其他变量的作用而有所减弱。在模型2中,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且回归系数都为负数,表明职业地位越低越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收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但在模型3中,当引入代际职业流动即控制了代际职业流动变量后,职业地位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不再显著,只有收入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且回归系数仍取负值。因而可以说,收入水平低者比收入水平高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而职业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则是通过代际职业流动这一自变量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当控制代际职业流动这一自变量后,职业地位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不再显著,且其回归系数均由原来的负值变为正值。

在能力与努力归因模型中,性别对能力与努力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P>0.05$)。在模型1中,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能力与努力归因作用显著,回归系数都取正值,表示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但当在模型2和模型3中引入其他自变量时,即当控制其他自变量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不再显著,表明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在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这两个自变量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显著性作用是通过其他自变量如职业、收入、满意度以及代际职业流动等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与年龄和上述其他自变量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其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以及满意度都会越高,其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职业地位与代际职业流动也存在这种情况。在模型2中,职业地位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但在模型3中当把代际职业流动这一自变量控制后,职业地位的影响不再显著,表明职业地位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真正存在显著性影响的是收入水平、地位满意度和代际职业流动。

收入水平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收入水平高者比收入水平低者更倾向于把成就的取得归因为能力与努力。而且,收入水平越高,这种归因倾向越强烈。收入水平为1万~2万元者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的概率强度是收入1万元以下者的1.725倍($e^{0.545}$);收入4万元以上者能力与努力归因倾向的概率强度是收入1万元以下者的5.186倍($e^{1.646}$),是年收入2万~3万元者的3.007倍($e^{1.646-0.545}$)。

在满意度中,只有地位满意度对能力与努力归因存在显著性影响($P<0.01$),其他两种满意度,即职业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都不显著。地位满意度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对自己的地位越满意的人们越倾向于把成就归因为个人的能力与努力。

代际职业流动和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关系也很能说明问题。只有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水平流动经历才对人们的能力与努力归因存在显著性影响,向下流动经历对能力与努力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向上流动变量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向上流动幅度越大,越倾向于成就的能力与努力归因。至于水平流动对能力与努力归因影响的显著性,则与父辈职业地位的高低有关,即父辈职业地位越高者,越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实际上,也就是子辈的职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成就的能力与努力归因。

表4是对机遇与运气归因和教育与身份归因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在机遇与运气归因模型中,性别对机遇与运气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P>0.05$)。年龄对机遇与运

表 4 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 自变量 | 机遇与运气归因 | | | 教育与身份归因 | | |
|-----------------|------------|------------|------------|------------|------------|----------|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 性别(女) | | | | | | |
| 男 | -0.134 | -0.142 | -0.143 | -0.175 | -0.175 | -0.175 |
| 年龄 | -0.014 *** | -0.016 *** | -0.015 ** | 0.014 ** | 0.007 | 0.006 |
| 受教育水平 | 0.039 ** | 0.032 | 0.035 | 0.056 *** | 0.024 | 0.022 |
| 职业地位(无一定职业) | | | | | | |
| 管理干部与知识工作者 | | -0.232 | 0.163 | | 0.372 * | 0.088 |
| 职员与私营业者 | | -0.298 * | 0.854 | | 0.061 | -1.473 |
| 工人 | | -0.204 | 0.419 | | 0.087 | -0.579 |
| 收入水平(1万元以下) | | | | | | |
| 1万~2万元 | | 0.216 * | 0.233 * | | 0.109 | 0.090 |
| 2万~3万元 | | 0.188 | 0.217 | | 0.076 | 0.055 |
| 3万~4万元 | | 0.335 | 0.356 | | -0.124 | -0.135 |
| 4万元以上 | | 0.402 | 0.392 | | -0.228 | -0.218 |
| 满意度 | | | | | | |
| 职业满意度 | | 0.022 | 0.029 | | -0.003 | -0.008 |
| 收入满意度 | | 0.076 | 0.078 | | 0.032 | 0.033 |
| 地位满意度 | | -0.124 * | -0.136 * | | 0.058 | 0.061 |
| 代际职业流动(父无职一子无职) | | | | | | |
| 向上流动 | | | | | | |
| 父职私—子管知 | | | -0.458 | | | -1.430 |
| 父工人—子管知 | | | -0.231 | | | -0.256 |
| 父工人—子职私 | | | -1.040 | | | 0.935 |
| 水平流动 | | | | | | |
| 父管知—子管知 | | | -0.185 | | | -0.386 |
| 父职私—子职私 | | | -1.022 | | | -0.831 |
| 父工人—子工人 | | | -0.357 | | | -0.006 |
| 向下流动 | | | | | | |
| 父管知—子职私 | | | -0.958 | | | 1.049 |
| 父管知—子工人 | | | -0.746 | | | 0.367 |
| 父管知—子无职 | | | 0.140 | | | -0.734 |
| 父职私—子工人 | | | -0.549 | | | -0.029 |
| 父职私—子无职 | | | -0.061 | | | -0.583 |
| 父工人—子无职 | | | 0.305 | | | -0.626 |
| Constant | 0.261 | 0.585 | 0.348 | -1.988 *** | -1.759 *** | -1.111 |
| -2LL | 2940.512 | 2924.423 | 2913.013 | 2595.539 | 2581.891 | 2573.264 |
| Chi-square | 32.059 *** | 48.148 *** | 59.558 *** | 19.819 *** | 31.467 *** | 42.094 * |
| DF | 3 | 13 | 25 | 3 | 13 | 25 |

注:自变量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即基点项。 * P<0.05, ** P<0.01, *** P<0.001。

气归因存在显著影响,且回归系数取负值,表明年纪越轻者越倾向于机遇与运气归因。收入水平对机遇与运气归因的显著性影响仅限于收入较低(年收入1万~2万元以下)的阶层,且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在低收入阶层内,收入相对高者较更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机遇与运气归因,如年收入1万~2万元者,其倾向于机遇与运气归因的概率强度是年收入1万元以下者的1.262倍($e^{0.233}$)。其他较高收入阶层(年收入2万~3万元、3万~4万元及4万元以上),其收入水平对机遇与运气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看重机遇与运气的,不是收入比较高的人,也不是收入最低者,而

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收入比较高的人不会把社会成就归结为机遇与运气，由于成功使他们充满自信；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不看重机遇与运气，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对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只有那些地位相对较低，但对未来仍抱有希望的人，才真正看重机遇和运气对获得成功的作用。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实际的研究结论。人们的地位满意度也对机遇与运气归因存在显著性影响，且回归系数取负值，表明地位满意度低者比地位满意度高者更倾向于成就的机遇与运气归因。

在教育与身份归因模型中，性别因素同样不存在显著性影响($P>0.01$)。在模型3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所有自变量对教育与身份归因都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只有在不完全模型(模型1和模型2)中，即在只控制部分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教育水平及职业地位对教育与身份归因才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这表明教育与身份归因在社会成就的4大归因类型中所占的份量最轻，亦即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认为教育与身份在个人成就的取得中，其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小。

比较表3、表4中影响4种归因的因素可以发现，影响内在归因与其他归因的因素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别。以自变量年龄对社会成就归因的影响为例，年龄对内在归因(能力与努力归因)及教育与身份归因的影响均不显著($P>0.05$)，但对外在归因(背景与关系归因、机遇与运气归因)却存在非常显著的作用($P<0.001$)，且回归系数取负值，表明年轻者较年长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背景与关系归因和机遇与运气归因。年龄与外在归因取向的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地位低者比地位高者更倾向于外在归因这一结论的具体表现，因为就社会总体而言，人们的年龄与地位的高低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地位会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年轻者比年长者对社会反应更敏锐且具有更强烈批判性的一种反映。

此外，从表3、表4还可以看出，对所有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的 χ^2 检验都具有显著性，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显著。但是，各整体模型检验的-2LL取值均比较大，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差。这可能与样本量比较大、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类型比较复杂有关，好在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解释^①。

四、结论与讨论

对照前文提出的虚无假设，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接受假设1，即性别不是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因素，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成就归因的4个方面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正是中国社会倡导男女平等观念、实行男女平等社会政策的结果和具体体现。传统的成就归因理论认为，强势群体、成功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而弱势群体、失败者则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外在归因。按照传统的性别观念，男性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女性是弱势群体，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取得成就。因此，男性与女性应该具有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即男性会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而女性则会比男性更倾向于外在归因。

其二，对于假设2，除了教育变量外，年龄、收入、满意度都对社会成就归因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可以拒绝假设2，即具有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满意度的人们具有显著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倾

^① 关秉寅、黄毅志(1997:174)的研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他们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据，其模型的决定值 R^2 均很小，内在归因的 R^2 值只有0.06，结构归因与教育归因的 R^2 值分别为0.023和0.04，这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差，或者说模型中自变量所能解释因变量的变异量比较小。对此，他们的解释是：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台湾地区民众对于成就归因有高的共识， R^2 自然就会很低，而且与他人的同类研究的发现很类似。因此，回归模型的拟合度低并不影响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正确认知。

向。按常理,教育程度与年龄、收入、满意度都应该影响社会成就归因。教育程度变量对社会成就归因的影响与年龄、收入和满意度不一样,可能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收入及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三,职业地位低的人比职业地位高的人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外在归因(背景与关系、机遇与运气);而职业地位高者则比职业地位低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能力与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拒绝假设3,即人们的职业地位影响社会成就归因。

其四,向上流动者比向下流动和水平流动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更不倾向于外在归因;水平流动者比向下流动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更不倾向于外在归因。由此我们可以拒绝假设4,即社会流动经历影响社会成就归因。

本文是一项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目的是要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检验社会心理学中关于成就归因规律的普遍性。社会成就归因理论要解释的是,社会公众对既定社会中社会成员成就取得的途径与方式是否存在一致的认知,形成这种认知一致性或差异性的原因是什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具有比较好的解释力,它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从宏观方面来说,社会成就归因理论能够对社会的运行状态进行描述和解释,也就是通过社会成员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的分析,能够反映出社会的运行状况与规律。例如本文通过中国公众社会成就归因倾向状况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公平的状况。人们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是人们公平感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社会公平感是社会公众对社会运行公平状况的认知与心理反应。如果社会公众把社会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为内在原因(能力与努力),表明社会的公平状况良好;反之,如果人们的社会成就归因主要取向是外在因素(背景与关系),则说明社会的公平状况可能存在问题是通过对比分析社会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成就归因倾向,能够更好地表现出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对社会的宏观解释能力。例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变量与社会成就归因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即女性与男性在社会成就归因倾向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别。这一结论不仅与传统的个体成就归因理论的逻辑相悖,而且与关秉寅、黄毅志(1997:151~182)的研究结论不同,他们的结论是女性与男性具有显著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取向。然而这一结论正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它有力地证明本文所建构的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女性与男性在社会成就归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别,正是中国建国几十年来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歧视女性的不合理观念,宣传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观念,并从制度上予以保证,从而根本性地提高了女性的自信心和社会地位这一系列社会事实在人们心理上所产生的反应。

社会成就归因理论的微观解释力,表现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传统成就归因研究结果的一致性。概括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及满意度越高、越向上流动者,越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能力与努力);反之,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及满意度越低、越向下流动者,越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外在归因(背景与关系)。如果我们把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满意度高和向上流动的人们称为社会中的成功者,而把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及满意度都较低及向下流动者称为社会中的“失败者”,则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社会中的成功者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为内在因素(能力与努力);社会中的“失败者”则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为外在因素(背景与关系)。而这正是韦纳传统成就归因理论的研究结果。

社会成就归因理论是对个体成就归因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个体成就归因理论只能解释单独个人的成就归因取向,而社会成就归因理论能解释社会大众的成就归因倾向。传统个体成就归因理论是通过实验室研究结果建立的,属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而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则是以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为基础建构的理论,是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社会成就归因研究所用的社会调查分析方法,虽然可以避免个体成就归因实验室研究方法存在的霍桑效应等缺陷,

但社会调查分析方法在研究社会成就归因时,同样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对于社会成就这一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就是一个容易出现误差的问题。我们把社会成就定义为既定社会中社会成员取得成就或事业上获得成功。社会成就的概念性定义是明确的,但它的操作化定义的确定,即如何运用定量指标去进行测量就要困难得多。而且我们的研究不是直接测量社会成就,而是要测量人们对社会成员取得成就方式与途径的认知,即测量社会成就归因。要测量社会成就归因,首先要让人们(被调查者)对社会成就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统一且明确的了解和把握。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们,对社会成就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测量指标,向被调查者明确、详细地解释社会成就的含意和包含的内容,使所有被调查者接受相同的“刺激”,然后做出不同或相同的反应。在本研究中,我们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工具和测量指标具有相当高的信度和效度。但是,我们研究社会成就归因所使用的测量指标和调查方法,仍有改进的空间,可以进一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使社会成就归因理论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 钟毅平(1999):《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认知理论与实践》,湖南教育出版社。
2. 关秉寅、黄毅志(1997):《台湾社会民众对成就归因及分配政策之态度》,载于张笠云、吕玉瑕、王甫昌主编:《90年代的台湾社会——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研究系列二(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版。
3.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曲恒昌、曾晓东(2000):《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 W·S·萨哈金(1991):《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周晓虹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6. M·H·邦德(1990):《中国人的心灵》,张世富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7. Michael Argyle(1997):《社会阶级心理学》,陆洛译,台湾巨流公司出版。
8. Heider F.(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9. Weiner B., Russell D., Lerman D.(1979), The Cognition Emotion Process in Achievement Related Contex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211-1220.
10. Ajit K. Dalal(1988),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6-7, Wiley Eastern Limited.
11. Morris Rosenberg, Ralph H. Turner(1990),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责任编辑:胡 涛)

欢迎订阅《老龄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专辑》
(《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增刊)

《老龄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专辑》涉及的内容包括:(1)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参与,以及老年健康的各个方面及其影响因素与改善老龄健康的对策;(2)老年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与改进老年生活质量的对策;(3)社会与家庭照料体系与健康长寿,如何在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及家庭养老功能下降后,促进老年照料体系的总体效益;(4)老龄经济问题与养老保险、老龄产业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5)健康长寿的社会科学与医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等。

该专辑约30万字,定价20元。读者可直接向本刊编辑部订阅,订费邮局汇款、银行信汇均可。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Fractal Geometry Theory Ban Maosheng Qi Weifeng ·39·

Based on the fractal geometry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study on urban system scale's fractal struc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using the data of 1990 and 2000 censuses, forecasts the scale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future by establishing fractal equ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Luo Jiaojiang Tu Hongbo ·44·

Based on the behavior attribu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theory and analyses some determinants that influence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through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the same law ruling both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attribution, and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theory provides better explanation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Population and Structure of Different Stratums in China

Zhang Yi Hou Huili ·53·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 Prestige Scale,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stratum structure of employees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armers, blue collars and white collars account for 64.0%, 23.9% and 12.2% of the total labors, respectively. Prof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onal managers only account for 1.1% of the total. Such stratum struc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candle-holder with a large base, which is still far from the desired.

Conditions and Determinants of County Population Outflow in Guangdong Province

Li Ruojian ·60·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2000 Population Censu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large population outflow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points out some serious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ositive effects of population outflow on rural economy. Due to structural rigidity, part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has been offset and negative effects still exist.

Debates on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and Necessity for Adopting It

Wan Chuan Wang Dezhu Li Bo ·66·

There are three waves of debate on the necessity of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in recent years. Some advocate to abolish it because of its conflicting with the Law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nd the citizen right of free migration. They argue that this restriction leads to the rural-urban divide, forms stratum discrimination, and prevents temporary population from being treated as citizenship with equal righ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ose points of view obsc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ee migration and free residence registration, giving the wrong explanation of the rural-urban divide, because they fail to give proper evalu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formed Choice's Impact on and Contribution to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cies

Zhou Weiwen et al. ·72·

Informed choi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sidents' rights to know the consequence of contraceptive methods and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It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role from administration to service. It introduces the human concerns and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 into family planning, significantly reshaping the practice of family planning and providing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ongoing reform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 China.